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虚妄的自足。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

丁东◎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双追 来忆

逝者

彤鹤川器节海林荫香巢溟兰鸥沫兰生良宜速年生野甄林民李普
汤用钱郭章于唐王林王钟梁冯冯沙杨成徐周一韦龚赵梁邢范季陈沈容蔡定

二十七段关于父母与时代的记忆

追忆者

云群林凡嵘晴阳治如城宽璞庵鬼夫贲博团程岛抗群央承丰美蒙
乐黛理小章于戴王林马阿梁宗止老野徐周杨龚北抗邢李季陈李亢蔡

追忆双亲

丁东◎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忆双亲/丁东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08-4951-3

I. ①追… II. ①丁…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292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1.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 丁 东

《先生之风》开印之际，陈大钢先生提议再编一本回忆亲属的散文集。我想，不如进一步细分为回忆父母、回忆夫妻等不同的专题散文集，或许更见特色。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父母去世，乃人之大痛。所以古人才形容大悲痛为“如丧考妣”。身为儿女，撰写回忆文章，寄托对父母的哀思，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有人说，爱和死是文学主题。把心中的爱献给父亲母亲，就是其中一个永远的分支。无论中外，父母疼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不知留下了多少千古佳话。

然而，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又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不禁使国人对老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

本书所选的文章，就是侧重于展示这种亲情坎坷的不同。

被追忆的父母，有文坛名宿，学界鸿儒，也有乡间医生，底层农妇。有的年高德劭，著述等身；有的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父母和子女之间，有温馨的交流，也有激烈的冲突，或源自代际的沟壑，或出于人性的异化。有的催人泪如雨下，有的让人如梦方醒。礼赞父母的恩情，怀念父母的美德，固然是人之常情。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反思，放在人性的显微镜里审视，同样值得读者珍视。

本书还有两篇文章的回忆对象不是父母，而是公公和婆婆。在我国，儿媳对公公、婆婆，女婿对岳母、岳母，也称父亲、母亲或爸爸、妈妈，民间的伦理也要求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视同双亲。这两篇文章角度独特，一位公公是学术泰斗，在儿媳最艰难的年代给了她精神的鼓励。一位婆婆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原来连名字也没有，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革命成功后才知道夫君早已另组家庭。而这位夫君，又是一位极受社会尊敬的领导干部。历史的背后，原本就有如许的人生苦味。

若干年来，我还读到过一些高级领导人子女感人的回忆文字，由于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履行专门的出版程序，所以只好暂且割爱。

二〇一一年一月

目录

1 序 ◎丁 东

汤用彤 哲学史家，1893年阴历6月21日生于甘肃渭源，1964年5月1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1 一块温润的美玉 ◎乐黛云

钱天鹤 农学家，1893年生于浙江杭州，1972年8月20日逝世于台北。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等职

9 哦， 你是我父亲 ◎钱理群

郭小川 诗人，1919年9月2日生于河北丰宁，1976年10月18日逝世于河南林县。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等职

14 泪捶绝壁 ◎郭小林

章乃器 政治家，实业家，1897年3月4日生于浙江青田，1977年5月13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等职

34 是父亲， 也是朋友 ◎章立凡

于昌节 干部，1929年生于湖南永州，1977年逝世于湖南衡阳

48 父亲的江湖 ◎于建嵘

唐海 干部，1983年逝世。曾任安达石油学院副院长等职

52 我的继父唐海 ◎戴 晴

王林 作家，1909年生于河北衡水，1984年7月2日逝世于天津。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58 **父亲王林和他的《腹地》** ◎ 王端阳

林举荫 医生，1909年出生，1985年逝世。出身农家，16岁起教私塾，后在乡间行医

75 **写在风暴之后** ◎ 林贤治

王春香 农民，1902年出生，1985年逝世

80 **婆婆的小脚和针线筐及其他** ◎ 马懋如

钟惦棐 文艺理论家，1919年生于重庆江津，1987年3月20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等职

86 **父亲** ◎ 阿 城

梁漱溟 思想家，哲学家，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1988年6月23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91 **我的父亲——梁漱溟** ◎ 梁培宽

冯友兰 哲学家，1895年生于河南南阳，1990年11月20日逝世于北京。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96 **云在青天水在瓶** ◎ 宗 璞

沙鸥 诗人，1922年出生，1994年去世。曾任《新民报》副总编辑、《北方文学》副总编辑等职

106 **最后的日子** ◎ 止 庵

杨沫 作家，1914年生于北京，1995年12月11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13 **母亲与我** ◎ 老 鬼

成克兰 会计，原名刘凌云，生于1928年，逝世于1995年

129 **江上的母亲** ◎ 野 夫

徐干生 教师，江苏淮安人，1920年出生，1998年7月13日逝世。曾任江苏省苏州市高级中学教师

138 **我替父亲整理遗稿** ◎ 徐 贲

周一良 历史学家，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2001年10月23日逝世于北京。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153 我的父亲周一良 ◎ 周启博

韦君宜 作家，编辑出版家，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2002年1月26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国青年》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

170 音乐中远行 ◎ 杨 团

178 附：《思痛录》成书始末

龚立逮 乡绅，1909年生于江西吉安，2002年逝世于台湾台中市

185 我父 ◎ 龚鹏程

赵济年 金融专家，1922年出生，2003年2月28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88 父亲 ◎ 北 岛

梁京生 编辑、记者，195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2003年5月12日因车祸去世。曾任中国青年报、中国电影报、中国科协报编辑、记者等职

208 银杏伐了 去看远山 ◎ 抗 抗

邢野 作家，1918年农历正月初一生于天津，2004年8月16日逝世于河北保定。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213 我的父亲 ◎ 邢小群

范元甄 干部，1921年4月生于武汉，2008年1月24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代厂长、国营二二三厂总工程师等职

253 她终于解脱 ◎ 李南央

261 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季羨林 语言文字学家，作家，1911年8月16日生于山东临清，2009年7月11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职

292 祭父文 ◎ 季 承

陈乐民 文化史家，1930年出生于北京，2008年12月27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等职

299 画里画外的父亲 ◎ 陈 丰

沈容 记者，导演，1922年6月2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2004年12月5日逝世于北京。曾任新华社记者、广东电视台台长等职

李普 记者，1918年8月生于湖南湘乡，2010年11月8日逝世于北京。曾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等职

313 **追忆双亲** ◎ 李亢美

蔡定剑 法学家，1956年10月生于江西新建，2010年11月22日逝世于北京。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等职

332 **我的父亲蔡定剑** ◎ 蔡克蒙

汤用彤

哲学史家，1893年阴历6月21日生于甘肃渭源，1964年5月1日逝世于北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一块温润的美玉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 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民主广场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寄出五毛钱，给新校址建一个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兴起！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大家郑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汤先生手上。如今，五十余年过去，旗杆已经没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但旗杆座却还屹立在北大西门之侧。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汤一介。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

是，赶在 1952 年 9 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 8 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的婆婆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大家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公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快快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呵。汤老先生和我的婆婆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

敞的燕南园五十八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听说和北大的其他教授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汤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的，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都委托给担任文

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恒订札记》中。

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周边写满了《诗经》中的诗句。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我们中国文

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十个青年教师，八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六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十六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长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八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八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右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复苏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渐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好像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理当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高兴，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

至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老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儒家的“长幼有序”罢，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

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十七年后，我有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汤老先生在美国时，原是在另一所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本武侠小说。我对他这样一个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很觉惊奇！白璧德先生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十分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汤老先生回国后，就和吴宓等一起组办《学衡》杂志。现在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学衡派”的分野就在于，一方要彻底抛弃旧文化，一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学衡派明确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汤老先生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人家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向前发展。他专门写了一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研究学衡派和汤老先生的学术理念，是我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起点。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比较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事实上，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锺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该向西方索取什

么，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徊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